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王水照主编

# 唐宋“古文运动” 与士大夫文学

朱 刚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王水照主编

本书系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 唐宋“古文运动” 与士大夫文学

朱 刚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朱刚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3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王水照主编)  
ISBN 978-7-309-09484-8

I. 唐… II. 朱… III. ①古文运动-研究-中国-唐宋时期②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研究-唐宋时期 IV. ①I209.4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560 号

##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朱 刚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47 千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84-8/I · 741

定价:3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985工程”三期科研经费的资助

#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

王水照

2011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书稿,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六人集”。这个想法源自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古语云“三十而立”,在这三十年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成为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从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出版,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第二,新世纪以来,由于博士生的扩招,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学术著作的出版较之以前容易许多,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有埋没精品之虞。过紧或者过滥,都不是健康的学术出版生态,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图书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及时从中遴选一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能够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

我的建议很快得到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他们都纷纷将自己

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简单来说有三种常见模式,即个案研究、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就其生平、交游、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究;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代,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历史还原等等。这三种选题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对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化,都还大有可为。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五朵金花”。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文学”的展开思路。我一直认为,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打工”的。与此同时,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畛域,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本套丛书收入了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曝《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种著作。朱刚、李贵、成玮的著作,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特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有着“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写了十余篇相关

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之说有所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历时十余年的修订,较之其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在他刚刚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学界相关论著还比较少,若干年过去了,“中唐—北宋”的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学界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值得庆贺,对李贵来说恐怕却是无形的压力。不过这部书稿雄辩地证明,好学深思的他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力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该书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与李贵的论题有些重合,但却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他在上编抓住诗学观念、文人分布和诗体发展三个重要因素,从制度、思想和文学的互动关系入手,清晰地描述出宋初三朝诗坛的具象图景。在下编则选取欧阳修作为描述框架,通过辨析欧阳修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或疏离,展现出仁宗朝诗坛的历史现场。这对于深化北宋诗歌研究,特别是对于探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甫曝、陈湘琳、侯体健的著作则是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分别涉及苏轼、欧阳修和刘克庄三位宋代重要的文学家。虽然都是个案研究,他们的方法却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个案研究的不同范式。金甫曝是韩国学者,他选取的切入点比较

小,《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一书就苏轼“和陶诗”的形式、内容、背景、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获得了不少与前人同题研究不同的具体结论。其中对韩国“和陶诗”相关资料的辑录和论述,更给国内学界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资料,这对于认识东亚汉字圈的文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

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一书表现出女性学者特有的敏感和视角,注重“美感经验”的发掘,对面向内心的欧阳修的情感体验、地域记忆、空间书写、生命底色、文化风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该书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运思精细,阐微发覆,以“细读”和“体察”的方法,从大量文献中摹画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欧阳修,并将这种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北宋文化整体的发展局势暗自勾连,跳出了原有研究窠臼,是近年来欧阳修研究的一大收获。

如果说陈湘琳的个案研究是“内省式”,侯体健的则可以说是“外烁式”。《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一书,吸收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关注到相邻学科的前沿与热点,从“晚宋文学生态”的大背景入手,展开对刘克庄周围世界与环境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凸现出刘克庄文学世界构成中的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复杂因素或基础,这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刘克庄和晚宋文学研究中可谓独辟蹊径、另具手眼。该书的研究框架和目录设置,也别出心裁,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是个案研究模式的新探索。

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无非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与新观点。本套丛书除了朱刚的之外,其余五部都是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是他们的处女作,也是他们向学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这六部书稿自然不是十全十美之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老师审读学生辈文稿,本应优点说全,以资鼓励,缺点讲透,俾便精进。这篇序文信笔写来,却多为褒饰之语,不免自夸之嫌。但我自信并非空洞赞扬,未违“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他们所作的可贵的学术努力,在新材料的发掘、新

方法的运用、新视野的拓展、新观点的提出诸方面,均已提供的不宜轻视、值得玩索的学术内涵。

我和六位作者都有师生之谊,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复旦园中共探学问之道,往事历历,犹如昨日。如今,我们或隔海相望,或同系共事,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我倍感欣慰。不过,治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他们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古文运动”与“文以载道” .....                           | 1   |
| 第一节 “古文运动”覆议——研究史和问题点 .....                       | 1   |
| 第二节 关于“文以载道” .....                                | 27  |
| 第二章 “古文运动”与“新儒学”的进展 .....                         | 43  |
| 第一节 中唐儒学所谓“尧舜之道” .....                            | 43  |
| 第二节 北宋“性命之学”与“太学体” .....                          | 58  |
| 第三节 “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 .....                       | 82  |
| 第四节 “周程、欧苏之裂”与宋代士大夫文学 .....                       | 105 |
| 第三章 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展开(上):思想心态 .....                      | 124 |
| 第一节 “神童”时代(上)——杨亿 .....                           | 125 |
| 第二节 “神童”时代(下)——晏殊 .....                           | 140 |
| 第三节 “日常化”的意义及其局限<br>——以欧阳修为中心 .....               | 154 |
| 第四节 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br>——读王安石《虔州学记》与苏轼《南安军学记》<br>..... | 174 |
| 第五节 面向公共“文坛”的写作<br>——北宋士大夫非集会的同题写作现象 .....        | 187 |
| 第六节 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br>——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 .....          | 211 |

|                               |     |
|-------------------------------|-----|
| 第七节 士大夫及其周边文人<br>——走向南宋 ..... | 230 |
| 第四章 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展开(下):贤良进卷 .....  | 250 |
| 第一节 北宋贤良进卷考论 .....            | 252 |
| 第二节 论二苏贤良进卷 .....             | 267 |
| 第三节 论李清臣贤良进卷 .....            | 288 |
| 第四节 论秦观贤良进卷 .....             | 310 |
| 第五章 晚年苏辙与“古文运动”的终结 .....      | 334 |
| 第一节 苏辙散文的基本风格与晚年变化 .....      | 335 |
| 第二节 苏辙晚年事迹考辨 .....            | 355 |
| 第三节 苏辙晚年散文与“元祐体” .....        | 376 |
| 第四节 吕本中政和三年帖的批评史意义 .....      | 393 |
| 代结语 北宋文学与政治 .....             | 413 |

# 第一章 “古文运动”与 “文以载道”

## 第一节 “古文运动”覆议——研究史和问题点

中国传统的文章体式，从先秦两汉时期“随言短长”的古文，转变到六朝隋唐基本上以对偶句结撰的骈文，及至中唐—北宋期间，则又再次转变到以单句散行的古文为主流<sup>①</sup>。至少就现存相关史料呈现的面貌来看，这前后两次转变的情形是很不一致的，前一次转变似乎不需重要人物去倡导引领，显得自然而然，后一次转变却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包含了许多人为的努力，故产生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都采取了“(唐宋)古文运动”的说法，用来概指后一次转变的历史过程。

本来，“运动”二字颇能反映出这一次转变的人为性、不自然性。然而，按20世纪中国学界的通行观念，历史上什么时期发生什么事情，大致都有其必然性的原因。依此观念去从事研究和著述，就会把“古文运动”解释成被各种历史机缘所决定的自然的结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它的人为性。但是，除非我们认定已经亡佚的汉魏时期的史料中曾经有过大量反对古文、主张骈偶

---

<sup>①</sup> 从名称上说，与“骈文”相对的应是“散文”，与“古文”相对的应叫“时文”。但是，“散文”一名现在另有含义（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散文”，可以包括中国传统的骈文），而“时文”一名在不同的时代所指有别（比如明代以八股为“时文”），这两个名词的含义都不够确定，所以本书以“骈文”、“古文”对举，这也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

的言论,否则就有理由发问:为什么当初由古而骈,不需要什么“骈文运动”,后来由骈而古,却需要一个“古文运动”呢?而且,即便只从韩愈(768—824)算到欧阳修(1007—1072),这个“运动”也历时两百年以上。那么,如果以“古文运动”为学术研究的课题,我们首先就应该为它的历时之久感到惊异:为什么需要两三百年的“运动”,才能把人们对偶句式解放出来?这样的解放岂不比近代推翻帝制的革命,比现代白话文运动还艰难许多倍?所以,今天看来同样值得惊异的是,关于“古文运动”的表述含有如此超越常情的内容,而近百年之间,多数人对此浑然不觉,或重视不够。——笔者这样说的意图,不在于自矜高明而指责前辈,只是想说明,“古文运动”的课题从其提出到后来的各种研究解释,都与20世纪的思想、学术语境紧密关联,当时的语境使这样超越常情的内容也显得似乎容易理解。

目前的学术规范要求研究者从事著述时先回顾相关课题的研究史,谓之“文献综述”。笔者也赞同这样的规范。不过,把研究史等同于“文献综述”,似乎是理工科的观念,人文领域的研究史不能被简化为研究文献的累积,或者说,这些文献不只是客观的研究结果的累积,而许多不够客观的言论,也不能当作错误而简单削除。所以,尽管已经有学者对20世纪研究“古文运动”的历史作了比较翔实的回顾<sup>①</sup>,但笔者仍拟联系上个世纪各个时期的思想、学术语境,再度作一回顾,从中分析出可以质疑的问题点,并提供自己认为可行的解决思路。

### 一、“古文运动”术语的提出

“古文运动”的术语,最早见于胡适的笔下。从1921年起,他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一课,同时着手编撰《国语文学史》讲义。这部讲义的油印本曾在当时

---

<sup>①</sup> 参考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十三章《唐代古文运动和韩柳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冯志弘《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北京的高校中广为流行,经过几次增订后,于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排印出版。《国语文学史》第二编《唐代文学的白话化》第三章《中唐的白话散文》中已经出现了“古文运动”一名:

“古文”乃是散文白话化以前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时期。平民的韵文早就发生了,故唐代的韵文不知不觉的就白话化了。平民的散文此时还不曾发达,故散文不能不经过这一个过渡时代。比起那禅宗的白话来,韩、柳的古文自然不能不算是保守的文派。但是比起那骈俪对偶的“骈体”文来,韩、柳的古文运动,真是“起八代之衰”的一种革命了。<sup>①</sup>

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胡适撰写了著名的《白话文学史》,但只完成了上卷,于1928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还没有写到唐代“古文运动”。不过他在《自序》里说,下一卷就要“从古文运动说起”<sup>②</sup>。他没有写出下卷,但“古文运动”一名却从此通行于学界。

很明显,胡适将“古文”纳入了白话文学的发展过程,认为“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学白话化的一个阶段,即从六朝隋唐骈文向宋元白话文转变时的一种“过渡”或者“革命”。这个观点的影响非常深远,虽然现在看来很不符合历史事实(韩柳“古文”不但不比同时代的骈文“白话化”,反而更难句读),但它却是胡适提出和表彰“古文运动”的初衷。我们从他留美时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他如何努力地思考着把中国文学史描述为文学语言不断趋向白话的过程,以为提倡“文学革命”的根据。1916年4月5日的日记已经涉及与“古文运动”相关的内容: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细之习。此亦一革命也。<sup>③</sup>

① 胡适《国语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重印,第58页。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骆玉明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之二(1915—19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3页。

类似的说法在1917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正式面世：

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彼以六朝骈俪之文为当废，故改而趋于较合文法，较近自然之文体。其时白话之文未兴，故韩、柳之文在当时皆为“新文学”。韩、柳皆未尝自称“古文”，“古文”乃后人称之之辞耳。<sup>①</sup>

韩愈明明自称“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sup>②</sup>，胡适却说韩、柳皆未尝自称“古文”，当然也不符合事实。但这可能只是偶尔失检，因为就算韩、柳未尝自称“古文”，他们的那么多标榜“复古”的言论，也不该在胡适的知识之外。尽管如此，为了以“文学革命”的观念构建中国文学史，胡适仍肯定韩、柳“古文”乃是历史上的“新文学”。当然，相对于当时流行的骈体来说，“复古”也具一种“革新”之效，问题是，既然主张“革命”，赞赏白话，则对于历史上的“复古”之言论、聱牙之“古文”，若径加痛斥，坚决否定，似乎更为理直气壮，为什么反而加以肯定，誉为“革命”呢<sup>③</sup>？这里隐含的推理是：真正的“复古”不可能取得成就，既然韩、柳文章的成就如此之高，那么根据某种以“革命”或“改革”为动力的“进步”史观，他们所进行的必然是一场“文学革命”。相比于以古文为“革命”之说，后来被接受的“运动”一词已经相对温和了。

应该深究的是，“韩、柳文章的成就如此之高”这个前提从何而来？除了对常识的尊重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出于对“古文家盛称韩柳”之现状的顾虑。面对韩柳文或“八家”文研读的巍巍传统，胡适不得不小心从事。事实证明，他的这番小心确实带来了良好的效果，民国时期即便对“新文学”不以为然的旧派学人，

①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② 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在胡适形成上述观点的时代，韩柳早已不是具有绝对权威的不可非议的对象，严复的《辟韩》发表于1895年，参见下文。

对“古文运动”的说法也乐于接受,或许他们还以手加额,从心底感激胡适之的居然不否定韩柳文。然而从另一立场看,此事也暴露了胡适的“妥协性”。同样是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其议论就更具“革命性”。此文虽也肯定韩柳文“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与胡适所论相近,但同时也对韩愈加以严厉的批判:

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訖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sup>①</sup>

毕竟,韩柳文之“师古”也是常识,所以虽许其为向通俗的“过渡”,陈独秀还是指责韩愈“文犹师古”。作为革命者,有这样的指责是理所当然的,但不知何以专责韩愈,而放过了柳宗元?难道柳就不“师古”,或者韩的“师古”名副其实,而柳是名为“师古”实则“革新”?我们不得而知。从道理上说,韩柳所“师”之“古”乃是比“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更古的先秦两汉之文,这何以不是倒退,而反能向“宋元国民通俗文学”过渡?我们也不得其解。接下来批判“文以载道”,看来颇能证明此文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引领作用,因为它马上将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但仅论观念则可,若究其所论内容,则将唐宋“新儒学”视为“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毕竟有违常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柳宗元也明明有份,何以亦独责韩愈?或许,陈独秀未必有轩轻韩、柳之意,只因韩愈名气更大,所以责贤尤备。但这篇文章的影响

---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45页。

实在不可小觑,数十年后,当韩、柳二人被冠名为“两条路线”各自的代表时,陈氏放过柳州而专责昌黎,将显得极具先见之明。

总之,“古文运动”的术语从它被提出的时候起,便含有为 20 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张本的策略性因素,就是说,即便是旧派所推崇的对象如韩、柳,历史上也是以“文学革命”创造“新文学”之人,而符合新派所执持的观念。这样大概可收一举两得之效,与有些旧派人物反过来称赞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擅作古文,策略性上正好相似。然而,包括韩、柳在内的“古文运动”当事人,确实留下了大量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不合乃至对立的言论,这就给后来继承胡适思路的文学史家带来一个极头痛的难题:如何使这些言论一一获得与其字面意思相反的解释?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绝望而放弃此类努力时,便很可能追随陈独秀的革命思想,而转向对韩愈的大批判。值得指出的还有一点是:变骈体为古文,本是文章体式或者说表达方式上的变化,这表达方式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原不囿于近代意义上的“文学”领域,但由于“古文运动”的术语是在文学史的领域被提出,而人们又相信文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所以“古文运动”如何体现了那样的规律,也成为有待解释的问题。

## 二、“中国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

“中国文学史”是 20 世纪发展迅猛的学科之一,百年以来,可谓名家辈出、名著迭现。为了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相对照,我们习惯于把此前的中国文学统称“古代文学”。这个“古代”与英语的 ancient times 或日语的“古代”并不同义,它实际上涵盖了日语中的“古代”、“中世”和“近世”,相当于目前欧美汉学家多用的 premodern(前近代)。如此宽广的“古代”概念,其实颇妨碍我们考察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变化,但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倒也不难定义,就是以文言文为正统表达工具的时代。说起来,中国人使用文言文写作的时间,也确实足够长久,而论其文章体式,却不过古、骈二体,在历史上各有其流行的时代,并且经过多次反复。虽